

# 在一个碎裂的世界里写作

□艾 伟

今天我们的现实充满了戏剧性。每天只要打开网络、报纸,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域中。读过一本叫《煤老板自述三十年》的书,一部纪实性作品。里面有一个煤老板,在香港看到蜡像馆,觉得很好,也想搞一个。中国农民都很有首创精神,别人搞过的他是不想再搞的。于是他决定造兵马俑。但他也不能搞得和秦始皇一样,所以,他决定搞一个当代名人兵马俑。他制作了一大批中国明星的兵马俑,其中之一是那个很有名的很胖的女歌手。他也想制作篮球明星姚明,但姚明太高了,工艺上有困难,只好遗憾地放弃了。现代名人兵马俑落成开馆后不久,他出了车祸,断了两根肋骨。这位煤老板从香港请了一个风水大师。大师在厂里转了一圈,对他说,兵马俑不能搞,太阳,想当年把秦始皇都克死了。于是这位煤老板就把这批现代兵马俑埋藏于深山。他戏言,几十年后又是一批文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实的经验丰富、阔大、饱满,其中的滑稽、惨烈和惊悚经常让我目瞪口呆,同时也让我涌出这样的感慨,同现实比起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既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如果要追究今天的状况,自然有其历史原因。曾经主导中国社会革命意识形态的是以“公”为核心的一种价值体系,它倡导公众“大公无私”。在这套价值体系中,私是必须去除的原罪。这里“私”的范畴是无比复杂的,它不仅是指私人、私利等,更指一切可以由个人支配的事和物,比如财产和身体。上世纪90年代,私人领域被打开,人的私心被合法化。但是,当原来的意识形态退出私人领域后,却没有新的有效的人心管理系统。社会的演进让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完全失效了,但它依旧是人们潜意识里认识中国社会、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框架,它统治一切的地位导致别的体系(如基督教、中国

的儒道)难以进入。于是当下中国社会就出现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的群魔乱舞的景象。人心无法管理,人性的恶成为一个真理,人的德性反而成为难以彰显的需要隐藏起来的情感,否则会被调侃或嘲笑。

我相信善、勇气和尊严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今天的中国,在精神价值领域可以说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肉感的气息,人们自得其乐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怀疑主义盛行,大家几乎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普遍经验,我们无所依凭。面对这样一个普遍经验,要书写人类正面的品质竟然成为一件无力的、困难重重的事。我们无法庄严、宏阔、秩序井然。我们只能在更小的尺度和方向上,去描述这种人类的正面力量,和这些正面情感有细小的相遇。这或许是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处境和宿命。

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面对这个时代,即使书写再困难,还是要去直面它。某种意义上刚刚发表的长篇《盛夏》(《人民文学》2013年第二期)就是这种困难的结果。在《盛夏》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就是柯译予。柯译予无疑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他既是真诚的,同时也是虚伪的,他很自私,同时又很慷慨,他既有内心的柔软和挣扎,同时也是冷酷和无情的。各种矛盾的气质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是平行不悖的。这个疯狂的碎片似的世界把我们的内心也砸得粉碎。今天,我们身上的任何一种品质都经不起严格的检测。一个没有精神可以依凭的人看起来就像是“表演者”。柯译予似乎也是这样一个“表演”的人。

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复杂的结构。在《盛夏》里,有三条线索相互纠缠,我在其中装入了这个时代的重重疑难和矛盾,由此和柯译予这个人物形成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我试图用柯译予的复杂性去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态的复杂性,身处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就像“盛夏”这个季节,充满了焦虑、不安和无名躁动,我们一片茫然,前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印 象

## “愿汝永远天真”

□黄咏梅

去年,电视剧《风和日丽》热播,我完整地看了一遍。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小说原著,不过,当电视配合画面很文艺地朗诵起“余愿意汝永远天真,愿意汝是屋顶上之明月……”这首诗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很欣慰,这首诗保持了对原著作者、我的朋友艾伟的敬意,也保持了对艾伟这一代人曾有的理想和热血的敬意。我深知,艾伟写下这首诗,作为小说《风和日丽》的结尾,更多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寄语。

认识艾伟近10年,一直觉得他就是个天真的人。现在,如果用“天真”去形容一个人,未必是褒扬,因为有了那个著名的“很傻很天真”的解构,当然,如果硬要用“天真”这样的词去形容一个中年人,还不免遭到“卖萌”的吐槽。可我还要说,艾伟是一个天真的中年人。天真这种稀有金属保存在他的日常生活态度和写作生涯里,闪闪发亮。

这个天真的人,安于宁波一隅,读经典写小说是他的主要事务,在我的理解中,这也是艾伟处理精神事务的主要方式——无此,他不可能多年如一日地住在小城成一统,早就被内心冲突的各种欲望驱使,出门找钱、找乐去了。至于副业,眼见他捣腾得最有影响的几件大事就是:摄影和绘画,每每自得其乐,虚荣心爆发了,会将几幅作品放到微信上晒,收获几位朋友的夸赞,便天真地得到了满足。此外,他偶尔还结络罗大佑的歌,看看各种口味的文艺片,围观微博骂架,甚至写几首拙厘诗歌。这种极简而让他满意的生活,使他看上去总像能呼吸到特供空气,清静、安逸,无过多的怨气,乐于接受命运的馈赠。往往,他获得的馈赠就比别人多,他在能见度极高的心里,看到了更多的悲欢离合、世道人心,他把它们一一呈现在小说里。

艾伟的天真,在于他深谙世相之后,仍旧能去相信,相信此际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相信人性中爱的力量,相信苦难中那些温暖的时光,并非虚构,也非偶然。在这个布满了怀疑的时代,相信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或者说,是多么天真的一件事啊。正因为如此,我总是能在艾伟的小说里读到一种挣扎着去相信的力量,这力量的释放与体会形式便是——深深的感伤,也是他小说的魅力所在。我很喜欢《风和日丽》里那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伍天安,他被青春的激情焚死,被理想的被褥包裹长眠,被天真的明月照耀。要是伍天安没死,我真不愿意去想象,他在21世纪的今天,混迹于这条激情殆尽的大马路上,也许还腆着他肥肥的肚子,正盘算着到哪里消费,到哪里娱乐,到哪里可以寻找到弥补青春的地方……这是现实,但绝不能安放于伍天安的身上,艾伟舍不得糟践他。在艾伟的小说里,很多人物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天真”,是艾伟在小说里小

# 写作者艾伟

贯穿悲悯气质的叙事

之所以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每次提及艾伟,我通常会首先想到他早年的小说《杀人者王肯》。这也是我与艾伟首次遭遇时读到的小说。我对这个有着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风格的作品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与本质之间分裂与聚合的故事,却奇妙地编织成了一个关乎尊严与人性的价值叙事;它精致的语言组织、回流畅畅的叙事体,以及那种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哲学气息,都让我深怀好感。此后,在《杀人者王肯》中已然彰显的某些风格在艾伟的其他小说里继续,而另一些新鲜的经验则扩大了其小说的语义空间。及至《风和日丽》,艾伟的全面、厚势、深邃,进一步提升了他在这个时代重要作家的影响力。我喜欢艾伟对自己的某些定位,比如,他用“黑暗”来比喻自己在叙事探索中不断出现的方向性迷失,这时候,他的谦逊与他的自信一样可爱;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用“黑暗”来表明他将生命本质中幽暗和卑微的一面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在写作中找到了立场。在他早些年间备受关注的短篇小说《乡村电影》里,由乡村宗法和权力级差造成的对立双方之间坚固的心理壁垒,霎时被电影《卖花姑娘》带来的苦难记忆所击穿:“不但滕松泪流满面,连放映机旁的守仁也几乎泣不成声了。”在谈到这篇小說的写作时,艾伟自己写道:“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关于意志力的小说在什么地方停止。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眼泪。当我找到这个结尾时,我有种通透透明的感觉。这是我在写作中感受到的光亮,我感到在暴力、欲望、强权之上存在着生命更高的法则:同情和怜悯。我相信,这是黑暗叙事最终方向。”因为对这个“最终方向”的坚持,使他的叙事贯穿了一种悲悯的气质:它真实绵长,又超拔脱俗,并借助机巧的修辞达到了感人的地步。

在艾伟的叙事学里,始终有一个我称之为“否定之肯定”的价值逻辑。比如,王肯以匕首刺掌的行为,来证明其“杀人者”历史身份的真伪,这其中,无论行为还是身份,都是价值的否定项,但最后却都与个人尊严相关,与个人存在的价值依据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必须被肯定的。艾伟善于以这样的悖论来展现和探讨人性的困局,并从中开掘出丰饶的人性内涵,尤其是当他持续地在一系列暴力场景中展示人性深处的图景时,这种“否定之肯定”的逻辑总有撼人的叙事效果。我非常喜欢的中篇小说《回故乡之路》,是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这个小说里,少年主人公解放因父亲不经意间犯下的“政治错误”而蒙羞,

他离群索居,藏身在秘密挖掘的巨型弹壳里体味孤独与卑微。为了夺回做人的尊严,他不惜通过惨烈的自残、通过制造所谓的“英雄事迹”来重新唤回他人的关注。当他幼稚的政治愿望被无情碾碎,当他再度身陷更为无情的唾弃时,他由极度的悲愤进而极度的癫狂,不断犯案进行报复,最后神秘地死在他栖身多日的巨型弹壳里。当人们打开弹壳时,发现他以红领巾拼成的国旗覆盖自己的躯体。这个小说充斥了血腥和死亡的气息,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被战争文化浸透的民族所提供给个人的真实的生存境遇,特别是,当个人只能通过依附政治才能获得个人尊严的资源分配时,像解放这样的少年所遭遇的“成长的烦恼”就无法从自我、个性、利比多及代际冲突等纯然生理学、心理学或文化学的阐释图中寻求解决。让尊严在死亡中绽放,让人性以反人性的方式体现,这样一种“否定之肯定”的悖论式的价值逻辑,构成了艾伟叙事理念的重要方面。

作为这个价值逻辑的另一种体现,艾伟小说中不断出现以身体贬抑来获得精神救赎的自虐式人物。在《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中,为了一颗玻璃弹子,少年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在《风和日丽》中,刘世军为洗刷曾为战俘的屈辱,十年如一日地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守护灯塔;在《爱人同志》中,战斗英雄刘亚军不得不经受年代更替而符号价值递减的精神痛苦,当他的尊严与外部世界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他竟引火自焚……这一组身体贬抑与精神救赎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个人在历史或社会境遇中的位置与姿势。弱者在获取生存与尊严这些基本的人道指标时必须支付的身体剧痛,使艾伟的叙述不断传达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无疑,艾伟的小说坚持了一种伦理质疑与伦理批判:不说自明的历史意志在碾过个体身体时,真的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吗?势不可挡的群氓意志在践踏个人尊严时,真的可以如此骄横跋扈吗?

我以为,正是这种清醒、坚定、锐利的批判意识,使艾伟的叙事摆脱了轻逸的美学抚摸和泛泛的道德咏叹,在对人性的不断反思中迈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深刻。

以人性为依据的“历史分析”

艾伟是一个颇为全面的作家。他不仅有纤细的人性发现,同时还有独到的“历史分析”。当然,他所有的“历史分析”,全以人性为据。

他于2000年出版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用一种看上去很繁复但实际上很简约的笔法,将从“文革”前夕到1990年代的中国历史划分为“政治时

代”与“经济时代”两个大段落。这样的划分是有创见的——迟至2005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时,相似的历史段落划分法才被再次使用,并引起热议。艾伟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样讲述了两个不同时代所存在的严重的人性异化:在“政治时代”里,人格被压降,尊严被铲平,步人只能以学马行走方可获得生存自由,四类分子只能在“天柱”这个虚设的空间里飞翔;“经济时代”里,欲望被释放,人性被屈抑,生活进入了博彩式的隐喻之中,天柱式的乌托邦亦不复存在。在对这段历史进行阐释时,他紧握“人性”的钥匙,解开了看上去纷繁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他试图凭据超历史的“人性”范畴来激荡政治、经济等历史现象,最终抵达对历史的永恒注解。简单地说,无论小说的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沦丧,艾伟真的明月照耀,它让主人公杨小翼从个人体验与个人悲剧出发,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中国革命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并为横陈半个世纪的“幽暗和卑微”,寻找最终的方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人性发现,还是历史分析,这部长篇小说都属不凡。

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期待

艾伟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猜忌与冷漠是人与人之间常态,一切道义上的正当性都会遭受质疑甚至被否定。这是他对当下世态人情的一种判断,我因此愿意用“黑暗”来形容他的世界观。他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小说都在叙写黑暗中屈抑的人生与变形的人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艾伟对世道有清醒的智性认识,但对人性却持有理想主义的期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叙写黑暗中不屈不挠的人性,叙写人性在灾难深重处的光芒。

这样的一种人性理念,在其长篇小说《爱人有罪》中得到彰显。这个引起过很大争议的小说,直接将人物摆上了“罪与罚”的架构,在其间拷问和检验人性的极致与可能。在这个小说里,鲁建因为一宗被误判的强奸案而入狱8年,当事人俞智丽为此长期负疚。她此后热衷公益,信奉宗教,以缓释自己内心的负罪感。鲁建出狱后,俞智丽毅然抛夫弃女,对鲁建以身相许,借此自赎。某种意义上说,俞智丽代表了我们的道德谱系中富于宗教感的形象,近乎一个现代神话。她和鲁建分别代表了极度的坚忍与极度的暴虐,代表了人性中最大的善与最大的恶。在见识过世间太多的残酷和暴虐之后,艾伟显然试图让俞智丽承载一下人性至善的重量,看看暴风骤雨般的施虐之后,人性中的善是否仍然能在铁屋子般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不屈不挠地伸出枝蔓,发出

□王 侃

新芽。《爱人有罪》是在人性深渊里的一道道德历险。俞智丽这个人物无疑会引发争议,因为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一个富于宗教感的道德圣女不仅是不可感知的,几乎还是不可想象的。或许,会有一些意见认为俞智丽的坚忍其实不过是性格的软弱导致,另有一些意见则可能会认为是“原罪”这样的宗教感支撑了俞智丽的救赎行为。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在艾伟的写作意图里,是他对人性至善一端的充分信任,才使他对俞智丽寄予了顽固的期待;她并不软弱,也并非无助,相反,她本身就是人性的光芒。

对于人性的这种理想主义憧憬,也使《风和日丽》这样沉重的叙写始终存有亮色。这部小说有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将军尹泽桂。这个人物,有诸多和普通入相似的身份,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是恋人、丈夫、父亲、外公、朋友、同志、官员、军人、诗人等等。但和普通入不一样的是,他是“革命”的符号,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现者。他身上布满革命的菌痕,却鲜有人性的温度。他遵从革命伦理,克制世俗情感与欲望。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革命伦理所能允许的狭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作为父亲、外公、诗人等角色的温情一面,以致于那个他一直拒绝相认的私生女杨小翼最终也在某个时刻与他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与和解。显然,艾伟总是相信人性会在某个时刻胜出,而不会永远匍匐着;他相信人性自有其规律,它脆弱但又坚韧,敦厚而智慧,既讷又敏,无处不在;他相信人性总是蓄势待发,而在屈抑中闪现的人性光芒必定有着更为动人的品质。我相信这是艾伟塑造尹泽桂这个人物的缘由。

读艾伟的小说,有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雨果和狄更斯。他的《乡村电影》让我想起《艰难时世》,《越野赛跑》让我想起《九三年》;他的《回故乡之路》让我想起《雾都孤儿》,《爱人有罪》让我想起《悲惨世界》。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让我想起奥列佛·特维斯特或者冉·阿让。他的小说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坚硬质地,又有浪漫主义的温暖情怀。这其中,尤其是他对于人性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其实在他看来,美好的人性并非一种浪漫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存在;人性也不是被悬置的价值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直接予人勇气的力量。

无疑,我愿意为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文学喝彩。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